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三民主義周刊

第

本
期
目
次

第五期

對解散新四軍應有的認識

革命青年應皈依「三寶」

機關與黨的轉化

怎樣建立我國的科學基礎

新時代的女子教育

記者

張文白

王冠青

鄧公女

盧執競

本刊航空版

香港 桂林 西安 金華

青年黨中央宣傳部

對解散新四軍應有的認識

記者

專門破壞友軍，蹂躪民衆，反抗命令，稱兵作亂，破壞抗戰，危害民族國家利益，國人皆曰應解散的新四軍，業已由最高統帥部明令予以解散了！這次對新四軍之被解散，我們無論從任何方面去看，都是千載難逢的盛舉。

但是解散新四軍的意義與性質究竟如何呢？我們實有明以瞭解的必要：

第一，我們以為這次新四軍之解散，是軍紀的執行，不是黨派的處置；我們要知道，軍紀乃是國家統一安定的基礎，尤為抗戰的前途，倘果軍紀廢弛，將帥權分散，則整個國家，必將立陷於混亂的局面，何足以言統一安定？更何況是抗戰？所以軍紀的建立與執行，乃是統一和抗戰的基本條件。而過去新四軍之所作所為，顯然是違犯了軍紀，而且是有意的破壞軍紀。既違犯軍紀，便要受應得的制裁，這與所謂黨派關係問題，完全沒有關係。其性質與李服膺韓復榘石友三等之受懲戒一樣。須知軍紀的執行與黨派關係，完全是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的。

第二，我們以為這次新四軍之解散，是黨統一的更進一步的表現，不是分裂的徵兆；我們要知道，徹底的統一，乃是近代立國的基本條件，每一個近代化的國家沒有不統一的。所以不統一就是我們的恥辱。我國現在的統一，雖已確具堅固的基礎，但是仍舊虛虛，仍有不少的阻力。如過去有意作亂的新四軍的存在，便是一個證明。現在黨統一新四軍，既完全解散了，那末，我們的統一基礎，便得到鞏固的保證，這無疑的為徹底統一的更進一步的表現，我們千萬不能輕視為分裂的徵象。否則便難免於黨統一的崩潰，便是中了敵人惡毒宣傳的毒計。

第三，我們以為這次新四軍之解散，是抗戰力量加強，不是抗戰力量削弱的徵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很容易明白；因為過去新四軍之存在，在數量上似乎加多一點，可是事實上，因為他們的槍口，專門向內不向外，時常襲擊抗敵友軍，故其結果，力量互相抵消，抗戰力量不但不會增加，反會減少。現在專門襲擊抗敵友軍的新四軍既被解散了，我們有多少抗戰的力量，便是多少力量，絕對不會發生抵消的作用。惟其如此，所以新四軍解散的結果，只有抗戰力量的加強，而絕對不是抗戰力量的削弱，這是非常明顯的。

由於上述諸點看來，我們對於這次新四軍解散的意義，便完全可以澈底明白了。我們始終要認清作亂性成的新四軍，是絕對應加以解散的，惟有加以解散，才是以建立抗戰的軍紀，才足以保證抗戰的勝利。因此，我們對於中央這次堅明的措施，要認清的擁護，並願為其執行的後盾。願得我們還要進一步號召全體國民，防止第二個新四軍的發生，以鞏固抗戰建國的基礎。

小 本刊第五期本應於一月二十九日出版，惟新時適因各印刷工廠春節放假停工，故延到今天始行出版，請向讀者致歉！

編輯及發行者 三民主義週刊社

社址：重慶臨心堂十二號

零售每冊壹角

半年二元四角

全年四元四角

（郵費在內）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經售

各地中國文化服務社分社暨各大書店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申官部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重慶市圖書經銷審查委員會審查證第二五七五號

革命青年應皈依「三寶」

張文白

一、什麼是我們的「三寶」？

我在中興軍校的時候，對於每一期新的學生，總要講一次話，講到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我們應皈依三寶」。大家乍然聽到這句話，以為我在講佛法來了，其實不然。佛家所講三寶，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我們所講的三寶，則是「擁護中國國民黨」，「擁護三民主義」，「擁護 最高領袖蔣先生」。最高領袖蔣先生，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黨就是我們現代「革命的三寶」，現在重要的同大家解釋一下，除了解釋我們擁護「三寶」的道理以外，也沒有其他的思想。

我們為什麼要擁護中國國民黨呢？因為中國國民黨是我們革命的集團，我們為什麼？

最高領袖蔣先生呢？因為蔣先生是我們革命的領導者。我們是一個青年，是革命的青年，我們應該參加這革命的集團，把握這革命方針，接受這革命的指導，然後才去圖做事，才能夠成功，才能夠革命。否則，他雖然說「革命，那老話的，那是空虛的，無所憑藉，無所根據的，試問：他所做的一切，既無根據，既無憑藉，怎樣還能革命呢？

二、為什麼要擁護中國國民黨？

我們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得很；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上獨來獨往，孤軍奮鬥，還在現代世界，現代潮流中，是沒有辦法可以存在。談到革命，那更是沒有辦法可以成功的。說到一個人的力量雖然有限，但是聯合

許多個人的力量就大了，或是集合三五百人的力量更大了，如果集合五十萬人力至三五百萬人的力量，那就尤大了。這是什麼道理？還是因為我們都來參加革命的集團，這革命集團裏的很多同志，都把個人的力量發動起來，便形成一個很大的總力量。這就是說個人力量和團體力量來講。

再則，我們一個人的生命，也是有限得很。現在大家的年紀，多數是在十幾歲乃至二十幾歲，正在青年的時代，將來能活到七十歲八十歲就算高齡，但是即使有着這樣高齡的生命，和歷史比較起來，那還是渺小得很，短促得很。就個人的生命講，假使我們的呼吸一下停止，那我們的生命和軀殼便隨之毀滅；但是如果就團體的生命講，假使我們參加了革命集團以後，我們的生命已經融會於團體生命之中，我們自己的生命雖然短促，但是有別人的生命繼續延長，這樣，可以延長至幾千幾百年，乃至幾千年幾萬年，從我們這一代可以延長到幾十幾百幾千萬幾億下去。什麼道理？因為我們一個人的生命雖有限，而代替繼承的却是無窮，這就是個人生命和團體生命不問斷道理。舉一個例子：譬如我們今天舉行「總理紀念週」，是來紀念我們死去的「總理」的；總理現在雖然已經死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在；他的精神所以不死，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國民黨，有了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有了三民主義的信徒，可以繼續他的革命精神，可以繼承他的革命遺志，一直看顧到將來無窮無限的時候，使他的生命延長下去，並光大起來；所以他的精神是依然存在，而不因為軀殼生命毀滅而隨之消滅的。這一點就是說明所謂永遠生命，即是精神永在的理由；也就是我們所以要求參加團體，發揚團體使命，擁

三、爲什麼要信仰三民主義？

其次：要說明的是我們爲什麼要信仰三民主義的問題。我們先問我們爲什麼要革命呢？革命就是種破壞，一種犧牲，爲什麼要破壞，要犧牲呢？有時，革命要我們殺人，爲革命我們也有被殺的時候。爲什麼要這樣？簡單的一句話便是爲了主義！如果我們革命沒有主義。我們革命沒有一定方針，那麼，我們不但被人殺沒有意義，沒有價值，同時我們去殺人，也是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主義便是我們堅決的信仰，爲了信仰，我們可以犧牲性命，爲了信仰我們也可以勇敢的去殺人。所以我們每一個革命者，一定要有革命的主義和方針，來作我們努力革命的根據，而每一個革命者，也都有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信仰；本着這個抱負，來犧牲流血，貫徹他的信仰，實行他的方針，然後這才有價值有意義。大家都是在學校裏面讀書，對於三民主義一定有很深刻的認識，所以關於三民主義的真理已不必多講，現在要講的只是就我的經驗而論，以我的思想變遷的歷史而論。我可以告訴大家，我認定三民主義的真理是一個適應現代中國環境的需要，是一個救國救民的主義。提起這話，自己覺得很慚愧；有人曾詢問說：「你們的三民主義都實現了沒有？你們的三民主義，真正實行了沒有？」我聽到這些話，感覺難以致答。但是我與大家講：三民主義到現在之所以不能澈底實行，這不是三民主義本身的缺陷，而是這班黨員，自命爲三民主義信徒的黨員，沒有真實把握這個信仰，這是就主觀方面講，種種阻礙，也有許多別的原因：譬如團體環境，國內環境等等關係，種種阻礙，使得三民主義不能實現，使得三民主義不易推行；特別是眼前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侵略，多少年來是我們三民主義實現之最大的障礙。我們應該人盡明白地看到，假如我們一旦自由獨立解放起來，是要先完成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

，遼東乃至世界，都要另換一個局面；所以他必得加緊壓迫，加緊侵略。我們起來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的抗爭，也就是爲了求我們中華民族自由獨立解放；也就爲實現我們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便是說：我們現在還在革命的中途，三民主義之完全貫徹實現，還不是眼前的事。但是我們成千或萬的同志同胞，都爲了這個一致的信仰而努力，爲了這一個信仰，我們不知流了多少血，我們也不知道要流多少血，才可以完成。但是無論環境怎樣困難。我們總是向着偉大的方針邁進！

四、爲什麼要擁護領袖？

照以上所講，我們既參加了革命的集團，又把擺着革命的方針，不是夠負担革命的任務呢？那還是不夠的。爲什麼不夠呢？就是因爲我們一個集團裏面，是有很多的人，是有幾十萬幾百萬的同志，如果各自爲政，分道揚鑣，那步調就不能整齊，力量也不能集中，革命還是不會成功的。我們要想革命成功，一定要有一個革命的領袖，來領導我們，使得這革命集團內的同志，無論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都在一個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統一意志，整齊步調，團結精神，向前邁進；然後我們才能革命，然後我們革命才會成功。這個道理，不用多講，每一個革命青年都會明瞭。但是有一點也得喚起注意。我們許多青年中還不少保有舊名士派的習慣，所謂「獨來獨往」，「惟我獨尊」，什麼人都不起，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像這種人，也是不能革命的，即使革命也是不會使革命成功的。所以我們現代革命集團，應該是一個關於革命團體的組織，每一個革命同志都應該有遵守紀律服從命令的精神；大家處在一個領袖的領導之下，向前努力，大家都從堅定的信仰這一個領袖，擁護這一個最高的領袖。這樣，我們的力量才能有大的發揮，我們的步調，才能有整齊的表現。以我們這種偉大的力量，這種整齊的步調去革

命，那沒有不成功的。這不是說大話，大家翻閱中外歷史來看，都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的；而在現代潮流中，更是有萬分的必要。這是講我們所以更接受最高領袖領導的理由。

五、對現狀要有正確的認識

我們每一個青年，參加了革命的集體，把握着革命的方針，接受了革命的領導，如果這種方面都做到了，才是具備革命成功的條件。不過我還要說一句話。有很多有熱血的盛氣的青年，不滿意現狀，對現狀感覺煩悶，尤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現狀，感着異常的煩悶和不滿。我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對於中國國民黨的現狀，我們也認爲是有中落的趨勢，正如一個家庭一樣，已經到了家道中落的時期；所以這樣，是因爲有若干的黨員，表面是掛了革命的招牌，事實上却在做着反革命的勾當，所以使革命的力量半途而廢，但真正革命者對這樣的現象絕不灰心；相反的，惟其看見黨的中落，我們才更要負起復興黨的責任，而且我們深信必定有一天必定有法子來把這些不健全的份子，不進步的份子，淘汰出去，陸續不斷的灌輸新的血液進來，使得中國國民黨的組織能夠健全，中國國民黨的力量能夠充實，活潑的生命重新生長起來。這一個時期并不在這，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實現。

六、要認識三寶的偉大！

大家要知道：現在中國國民黨雖然有若千少數的黨員不健全，不爭氣，但是中國國民黨過去奮鬥的歷史，爲主義爲革命奮鬥的歷史，是絕對不可以磨滅的，是誰也不能磨滅的，我敢請中國國民黨的本身，無論如何，到底革命的黨，到底是革命的集團，絕對不能抹殺他的偉大的存在。至於說到三民主義，剛才已經講過，以我的經驗而論，這我的思想而論，一直到現在，我是激發始終做了個三民主義的信徒，這

也不用多講。說到最高領袖，現在我們國家民族唯一的——最高領袖蔣先生，其崇高偉大，是具備所有革命領袖的條件；在世界上，在中外歷史上，一切革命領袖的條件，我們領袖蔣先生無一不具備的。我追隨蔣先生革命多年，自信認識得非常透澈。也有些近視眼的人說：蔣先生固然偉大崇高，但是爲什麼他領導革命至今還不能把中國統一起來，獨立自由解放起來呢？關於這點，我可以告訴大家，你們看看世界上革命領袖由許多其他各國政黨的領袖怎麼來，以地理來講，以歷史來講，以人口來講，以國民教育程度來講，他們革命復興的工作，無論如何都比不上中國革命復興工作的艱鉅。爲什麼呢？大家想想，意大利有多大的領土，有多少的人口；德意志又有多大的領土，多少的人口？他們都是遠不如中國人口之多，中國土地之廣。即以蘇聯來說，雖然他的領土比中國大，但人口則比中國少得多，而且他們國民教育程度却比中國高。他們有着這樣較小的困難條件，所以他們各個革命領袖容易成功，而我們中國革命的進程是比他們困難許多，自然需要的努力也是更大。最高領袖蔣先生領導我們全國同胞，全體同志，來努力奮鬥，是值得我們敬佩，尤其值得我們擁護他的。爲了加速完成革命，我們一定要擁護他。假使我們全體同胞都擁護他，他就可以完成大業。

我們要知道：中國民族復興工程之艱難困苦與偉大，是比任何一個國家更艱難困苦到十倍以上。如果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偉大的領袖蔣先生來領導，我們的地位還不知道要低落到什麼樣子。現在雖然已經到了嚴重的局面，但是只要我們接受偉大領袖的領導，則我們一定可以打開危局，一定可以達到成功的目的。每一個革命的青年對於我們全民族的唯一領袖，應該有正確的認識與堅定的信仰，對絕不能輕易搖動，疑惑，或者存着偏見，應該竭誠的接受領導，服從領導，一心一德，努力前進，我們革命一定很快的成功，個人事業與國家民族復興的事業，也一定可以很快的成功。

評量與質的轉化

王冠青

量與質的轉化，是唯物史觀辯證法的第二個法則；第一個法則是矛盾統一，作着前次在本刊上已經加以批判，現在繼續對這第二個法則，來加以檢討評議。

由量到質由質到量的轉化法則，是矛盾統一法則的一個發現形式，唯物史觀者直接根據這種法則去認識歷史解釋歷史。唯物史觀者不但根據這種法則去解釋人類過去的歷史，同時根據這法則去判斷人類未來的歷史，更不但用來判斷未來的歷史，同時也用來解釋當前的時事。如果這法則是對的，那麼，他們的解釋與判斷完全正確，如果這法則是不對的，那麼，他們的解釋與判斷完全錯誤；如果有些說得有些不對，那麼，他們的解釋與判斷便有瑕疵。因為他們這種解釋與判斷，同時也運到當前的時事問題，所以其正確與否，便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時事問題的態度與行動的是非得失。是這樣一個直接對於全體唯物史觀信徒的一個行動指導的綱領，到底是否正確，是值得我們費些工夫來檢討的。

記得上次「對於矛盾統一法的批判」一文中，我曾經引述「總理民生主義中的幾句話是：『照馬克思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所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古時有主人和奴隸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有社會革命完全成功，這兩個互互相爭的階級，才可以一齊消滅。』」總理對於馬克思這種認為人類社會自覺風風靡靡地以來，就一直生着這階級鬥爭的病症，自從有歷史以後數千年中，一刻兒也不會好過，要到社會革命成功，才能全愈，而且愈後永遠不發的辦法，並沒有完全同意。但是現在世界上，却有千百種依據唯物史觀立

揚所編的歷史課本，完全是照着這一成不變原則來敘述。他們敘述歐洲的歷史，並不照着普通上古中古近古的劃分，而用「封建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時代」等的劃分；同樣敘述中國的歷史，也不問周商秦漢，而用「封建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時代」等來劃分。實言之，照他們的說法便是：在民國以前，統統是封建主義時代。其間不問與族統治世界，本族自治也好，世運昌明也好，國家離亂也好；總而言之，甚要不得的封建主義時代。至於民國以後不問是軍閥專橫也好，不問是國民革命也好，總而言之，是資本主義時代。他們把資本主義與國民革命混為一體，叫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主張民主革命以後再來一次社會革命的二次革命論。雖然他們這種敘述歷史的方法，並不是忠實地要把各色各樣的社會史實，加以恰如其分的描寫；而是忠實地要將一成不變的辯證方式，套在各色各樣社會史實的頭上。雖然他們對於歐洲的歷史，特別對於中國歷史的解釋，頗多歪曲，然而很多青年聽進了他們歷史的辯證綱中，卻沒有本事再跳出來。於是明明在當前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光輝時代當中，却偏偏自認爲與身於資本主義的黑暗社會之中，憔悴呻吟，幻想在三民主義革命之後，還有一種怎麼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

然而到底什麼是什麼他們選擇一般的歷史辯證綱呢？到底他們對於中外歷史的解釋，是根據着什麼高妙的方式呢？毛寶說，就是量到質到量的轉化法則，也就是矛盾統一法的表現。這種法則，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很對的，不但表面上，實際上在某些局部的觀察，也許並不爲錯。我們對於唯物史觀的批判態度，並不是「一腳踢開」全盤抹煞，而是透視了他的長處，發覺了他的短處。總理對於馬克思的學說，並不

是一概抹煞，而是以進一步的剖見，去評定他的短長。

就質變法則的實例來說，譬如他們說「封建社會的生產情形，達到它發展的一定階段，就極端地限制了生產力和物質財富的成長可能性，限制了社會發展的全體水準。這限制，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勝利了的結果，才被打消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盡了進步的作用，然而現在却變成阻礙社會繼續前進的障礙物，最後又需要社會主義來打這這種障礙。」唯物史觀者的這種舉例，表面上看似乎不錯。這實例「在質與量轉化」的意義上就是說，封建社會有其特「質」，這種特質形成以後，就逐漸成長以至於成熟，這是由「質」的形成而逐漸到了「量」的推廣，這種推廣是漸進的而非突變的。等得這種「量」的推廣達到一定限度以後，反而防礙了「質」的進步，於是出突變的而非漸進的方式，形成了一種新「質」，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用同樣漸進的方式推廣它的量，到了一定限度，又突變的成為社會主義的社會。這種量變化的法則，表面上看不是很對的嗎？他們以為一種社會到了將要突變的時候，就是量與質矛盾到了極點，於是山一種新質來加以統一。但這新質裏面，同時又含着新的矛盾，而需要另一將來的突變來加以解決，這種矛盾統一，我們看得出它的缺點嗎？

唯物辯證法者的基本觀念以為人類社會始終是在質與量變化當中，除了質與量的變化以外，便沒有其他不變的東西。但是，總理却在人類社會質與量的變化之外，發現了另一不變的東西，那就是「民生」在人類史的重心，無論人類社會質與量怎樣變化，總逃不了一個人類生存的目標。人類社會質與量的變化，並不是盲目的，也不是一個老公式的重覆演變而毫無改進的可能。唯物史觀者的所謂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乃是人類社會隨着時間而演變的各樣形式，而不是人類社會的本質，人類社會本質上有一個不變的特性就是「求生存」，這種求生存的特性，並不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到一定限度，而突然地

變為「求生存」。一人求生存，一國求生存，全世界人類也是在求生存。古代人類是求生存，現代人類是生存，將來的人類還是要求求生存，這可證明量的變化並不一定引起質的突變。唯物史觀者的所謂「質」，是人類社會在時間上的演進的形態；他們所謂「量」是人類社會在空間上的擴展的範圍，他們祇看見了人類社會在時間上空而上變化的兩方的表現，而沒有看見人類社會的本質，所以發出了盲目的質變法則。人類社會的本質，是由 總理的民生史觀才正確的指出。所以質變法論的基本觀念上就有一個不可補救的重大缺陷。

因為盲目的質變法論根本是一種不完備的辯證方式，所以就必然地產生了她如下駁訛歪曲的認識結論：

(一) 政治理想與哲學方式不能一致 如果人類社會的確是依住這「由質漸進到量，由量突變到質」的方式反復演進，那麼將來經使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造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特質，將來這種特質擴展到一定的量，必然又會發生障礙與突變。也就是將來必定還有一種新的第三次或第四次革命來革社會主義社會的命，正如社會主義革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革封建主義等一樣。但唯物史觀者的政治理想，却以為社會主義成功，便永遠消滅了階級鬥爭。這就證明他們的政治理想和哲學方式的不能一致，這就是質變法論的第一根疵。

(二) 將資本主義和民主革命混為一談 人類社會本以求生存為目的，但是到了封建制度下的封建主，因為專橫殘暴，妨害了平民的生存，於是平民起而推翻封建制度，這是民主革命的史實。民主革命與資本主義，乃是偶然的遇合，而並非必然的結合。歐洲的民主觀念，遠肇於柏拉圖共和國的夢想，到了十三世紀英國的政教革命，便已開始成為歷史上重要紀載的一頁；此後一七七六年的美國革命，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相繼成功，總理稱之為「民權

潮流」，由民權潮流而形成了「民權時代」。同時世界上有另一潮流，却是在十六世紀之末十七世紀之初，英國培根（Francis Bacon）等的經驗論出世，他的名言「智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a Power）啓示了人類克服自然的宏圖，於是科學進步，機器日精，形成了工業革命，更由工業革命而產生資本家與資本主義。這兩個源頭相去千里的潮流到了十八世紀偶然會合，恰巧美法革命民主革命成功，奠定了民權時代礎石之際，正遇着德英等國工業革命的急遽進展奠定了工業革命時代，馬克思憑着他的經濟史觀，認為一切政治制度必然是經濟制度的產物，於是硬派民主政治是由資本主義而產生；而且一筆抹煞民主革命掃蕩封建壓迫的功績，以為封建社會的矛盾是由資本主義來加以統一。歐洲工業革命後很多祇曉得為自己發財打算，從不曾想到爲一般平民解除封建痛苦的資本家，却平白無端地冒領了民主革命功臣的頭銜，他方面多少爲平民革命流血的志士，却一律被認爲資產階級的附屬品。就三民主義的立場來看，民主革命並不是由資本主義而產生，資本主義不過是民權時代一種傳染的病征，民主革命是治療人類社會政治上封建病態的藥石，而資本主義却是人類社會經濟上的一個病態。三民主義認爲人類社會病苦生存的病態有三，第一是國際不平的病態，要用民族主義的藥去醫治；第二是政治不平的病態，要用民權主義去醫治；第三是經濟不平的病態，要用民生主義去醫治。那些是藥，那些是病，是非黑白，分別得清清楚楚。但唯物史觀者的看法，却不免認藥是病，認病是藥。把政治病態的藥——民主革命，和經濟的病態——資本主義，混爲一談；不說藥中有病，說藥是由病而生，這就是質量變化論第三個壞處。

(二)不懂得三種革命一次完成的可能性 由上觀察，質量轉化論者，只看到了人類歷史的局部，而沒有看到全部；而且他們以

這局部的看法到處可用，隨時可用，於是錯誤發生。總理對人類社會的病態與病源，用三民主義指示了常態的生理學上同病異源下了病態的藥方，這種藥方，就是三種病態一次治療的三民主義藥。但是依據質量變化論者的局部觀察，便不能理解這種一次治療的可能。他們因爲將民主革命與資本主義混爲一談，所以不認藥與病。要用社會主義的藥來醫治，同時認爲民主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病，也要用社會主義的藥來醫治，因此就主張民主革命以後，再來一次社會革命的兩次革命論；他們既然要以藥醫藥，當然便認兩種藥同時並用一次醫療爲不可能。這種錯誤，就是由於他們將民主革命與資本主義混爲一談的歷史分析的錯誤，而必然產生的錯誤結論。他們另一方面的重大錯誤，就是認爲資本主義這病症是不能夠預防的，他們以爲人類社會到封建制度掃蕩以後，必然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產生以後，必然慢慢地成長，到了最後階段變成了帝國主義，這時資本主義的演變已經進到量的飽和點，然後突然地變爲社會主義的新質。這種看法，等於在剛巴拿馬運河的時候，看見了若干人受瘧疾的傳染，生黃熱病而死，便以爲凡到巴拿馬運河者必然染黃熱病而死，沒有預防和改進的可能。這種看法顯然是十分狹隘的。須知人類是有理智的生物，「試驗與錯誤的方法」(Trial and error method)，在初級動物的心意上，已經發現。將日本的舞鼠(Ratting mouse)置於歧路之前，一路可通風穴，一路不通風穴，經過幾次的試驗以後，她便再也不走那不通風穴的歧路。人類的偉大在於不但能用自己的錯誤改正自己的行爲，而且能用別人的錯誤作爲自己的殷鑒。古今的政治得失，列邦的革命歷史，都是我們大好借鏡的材料。歐洲國家在民主革命之後，有些誤入了資本主義的歧途，日本民治維新以後，也盲目的跟着資本主義的尾巴走入歧途，這種盲目或短視，誠然舞鼠之不如。蘇俄比較聰明，

所以在俄國資本主義初萌並沒有發展到帝國主義高段的時期，就轉入了社會主義的途徑；美國的聰明是另外一種用法，他們用國家社會政策，沖淡了資本主義的成份，而便不至走入極端的帝國主義。

總理總提各國革命歷史的得失，在中國革命之初，就預先指出民族革命以後，走入民生主義而不走入資本主義，民族革命以後，走入大同主義而不走入帝國主義。中國革命成功，雖然在各國之後，但是革命的經驗的豐富與方法的正確，却超於各國之前，所以不成功則已，一旦成功便是三種革命同時完成，此即所謂迎頭趕上與後來居上的辦法。但是依據質量變化論的頑固意見，却以為迎頭趕上是不可能的，只有採取盲目的尾巴主義。先假若日本等國家的覆轍，來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步着蘇俄的後塵，來一次布爾喬維克的社會革命，這就是二次革命的理論根據。這就等於看見一個老馬走入歧途，就以爲個個老馬必然經過歧途，甚至以爲人羣也和老馬一樣，必然經過歧途然後才能走入正路。所以明明在總理總裁先知先覺的領導之下，向着三民主義的大道邁進，然而無病呻吟，硬說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歧路過渡的階段，而且別人不走歧路，偏偏要拉入歧路，想用資本主義的議會形式來代替國民大會，用新民主主義來代替三民主義，想造成錯誤的事實，來符合自己錯誤的歷史學說，這些錯誤的發生，就是由於不懂得民族革命民生三種革命一次完成的可能。這就是質量變化論的第三個覆轍。最後我們提出簡單扼要的結論是：民生是歷史的重心，是人羣社會的本質，本質是不變的，所謂質與量的變化，不過是民生在時間上與空間的進展，雖然對立並不矛盾。這種正常的進展，就是 總裁廣開「民生

而行」，只有善沒有惡，只有相輔而行，沒有抵觸矛盾，但是在質量上發生了病態的時候，阻礙了正常的行，於是在某些時間或某些地域，發生了妨害民生的問題，於是才矛盾才發生。這些問題歸納起來，不外：

(一) 國際問題——帝國主義等——用民族主義來解決

(二) 政治問題——封建主義等——用民權主義來解決

(三) 經濟問題——資本主義等——用民生主義來解決

這三個問題可以一次解決而且應該一次解決，質量變化論者所以認爲三種革命不能同時解決的原因，因爲他們誤將民主革命與資本主義混爲一談，硬說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是一個矛盾，所以就發生了二次革命的理論。其實，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封建主義與民權主義，資本主義與民生主義之間，雖然是矛盾；但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之間並不矛盾，因爲並不矛盾，所以可以相資相輔共底於成。而且人類理智所可能的加於質量變化的影響，他們全不理解，人類能夠利用他人的經驗，作爲自己的經驗，利用其他國家社會質量變化上的教訓，促成自己國家社會質量變化上的突破邁進，這種質與量的交換和調和作用，在科學和哲學上都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用一個星期，熟讀了 總理的民權初步而又加以身體力行，歐洲議會制度三百年來的質的進展，我們便已迎頭趕上；再用一個星期熟讀了總理的民權主義而又加以身體力行，歐洲民主制度（即）的質量，便達到我們的後頭，根據 總理的民生主義，便不會再走入資本主義的歧途，根據總理的民族主義，便不會再走入帝國主義的歧途，根據這種取人之長而去其短的法則，是縮短時代迎頭趕上，一次完成三大革命的要訣，總理的心理建設學說，總裁的力行哲學中，對此都有同樣指示，我身後希望質量變化早被進程所迷途的青年，對此加以虛心的研究。

怎樣建立我國的科學基礎

鄧公玄

一、孫文學說的科學精神

總理在孫文學說裏面闡明知行易的道理，其動機與目的固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以期達到政治的建設，但其意義却不限於革命的政治建設一方面，因為我們如果了解了「總理的真諦，便同時可以推遲到建立我國的科學基礎上面去。我們要想使知行易的道理發揚光大，也只有從建立科學基礎的方面着手，方能達成偉大的效果。假如我們不先從建立科學基礎着手，則知行易的道理絕不會普遍的為國人所接受，因為沒有科學的頭腦和精神，那麼，一般人對於知行易的學說，充其量還是站在「信仰」的立場去擁護他，而不是由「理解」的立場去服膺他。

孫文學說的倡導，到現在已經在二十多年了，然而我們體察所得，似乎一般人還是將信將疑的態度，所以三民主義的主張，到今天依然不能見諸實行。不論關於政治的經濟或社會的建設，始終不能澈底的依照三民主義的道路去進行，無非是由於大家心目中還是牢牢的抱定一種「知之困難行之惟艱」的舊觀念的緣故。這種「知之困難行之惟艱」的觀念，總理認為是革命的最大敵人，我們要克服這個最大的敵人，首先便要從建立科學的基礎開始。從革命的意義來講，如何建立科學基礎一層，實在是抗戰建國程序裏面一種最重要的工作。

自從抗戰四個年頭以來，因為敵人的飛機在後方施行盲目的轰炸，使窮鄉僻壤的老百姓，都直接間接的感受嚴厲的威脅，大家都了解到科學的殺人利器之殘酷，因而漸漸的知道科學權力之偉大，認識科學效用之切實，從民智的進步方面看來，的確有驚人的收獲，我們不能不說是

敵人所意料不到的兩命禮物。但是徒然的了解科學的權力和精神而效用，而不能積極的把我國的科學基礎建立起來，這是不配達到現代國家的道路上去，革命依然不容易達到目的，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建設依然不容易有長足的進步，豈不是一件最可惜的事嗎？

二、中國為什麼未能走上科學的道路

中國差不多有五千年可考的文明，而且一統相承，未曾中斷，這是我們可以做視全世界人類的，但是我們始終未能走上科學的道路；從概括的方式來說，我們民族的特質是廣大的，和平的，中庸的，現實的。但是因為廣大的所以不細密，不深入，以致思想籠統放漫，而缺乏論理學的修養；因為和平的，所以不喜競爭，不好戰鬥，而缺乏對勝進取的傾向，因為中庸的，所以不偏激，不徹底，而缺乏追根究底的精神；因為現實的，所以不重理想，不重原理原則，而缺乏求知求真的勇氣。所以拿中國的整部文化史看來，在好的方面造成了一種崇尚倫理道德，注重身心修養的淑世主義；在壞的方面造成了一種籠略客觀，輕視理知的唯心主義。

數千年來我國古聖先哲所遺留給我們的兩大類的寶貝，第一類是關於人生哲學上的教訓，第二類是關於文學藝術上的創造。這兩大類的東西，無疑的是站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最高峰，但是人生哲學與文學藝術都是從主觀生產的結晶。換言之，即在美善的方面有特殊的貢獻，而對於求真的意義却忽略了。固然，我們的祖先對於物質文明，也有不少的偉大發明，譬如指南針，造紙術，印刷和火藥等，均於近代文明有極大的

關係，然而這些東西的發明，還是屬於藝術方面的創造，而不是根據科學的原則所發明（我這樣的說法，也許有人以爲不然，但過細科學的意義來推測，才知道此種說法並非武斷的）。也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指南針自黃帝（或以爲是周公發明的）發明以後，數十年之間，沒有充分發揮科學的用途，反而變成了那些迷信風水的堪輿家用占卜地下吉的工具。火藥則除了做簡單的爲槍火炮之外，也不過用作花爆煙火等類的娛樂品而已。惟有造紙與印刷兩項發明，比較能夠盡其最大的效用，這是因爲我們民族特別崇尚文學藝術的緣故。

我們的祖先既然能夠發明這許多的東西，那就證明我們民族的智慧是偉大，爲什麼有了偉大的智慧，而不能走上純粹科學的道路，造成歐美近代的文明呢！仔細考察起來，其最大的理由就是因爲我們民族偏重主觀的情意的發展，而忽略了客觀的理知方面，所以人生哲學和文學藝術特別有貢獻，而對於純粹的或應用的科學都很少成就。

三、科學與愛知的興趣

人類的知識的起原，即在於「愛知」的興趣，有了愛知的興趣，所以才肯對於一切事物發生懷疑，由懷疑而生假設，由假設而證明，層層推進，步步改正，以次達到真實可靠的知識。西文哲學 *Platon* 之本爲「愛知」之義，所以哲學家就是「愛知者」，而哲學乃是愛知所得的結果。西洋的科學是由哲學發展而來的，所以科學當然也是愛知的結果。

「愛知」的興趣怎樣才可以養成呢？第一件要緊的就是多多的懷疑。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物，都要打破武斷的解說，即使是大家認爲當然的，也應該以懷疑的態度去追根澈底。有了懷疑，然後會想出各種方法去求得解答，有了各種不同的解答，然後加以比較說明，得到比較可靠的知識，而這種比較可靠的知識，也必須認定是暫時

的一種假定，而不能當作不可變更的最後判斷。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態度，然後不致爲古人的奴隸，而我們現在所認爲至當不悖的理論，還可以讓後人去發展或改進。人類之所以能夠獲得正確的知識，科學之所以能夠有成就，世界文明之所以有進步，無不淵源於此。

但是人類是有情性的，尤其我們民族的性情特別的深厚。因爲人類有情性，所以對於宇宙間的事物物，最容易相信古人或前輩如父兄師長的武斷，而不願自行運用其腦筋加以理解。宗教家說世人類都是上帝（或神）造成的，上帝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力量，我們的一切善惡是非，上帝都在那裏注視着，我們往往毫不思索而信以爲真。又如我們古書上說中國的道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傳下來的，凡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言一行無一不是天經地義，如果有人主張和他們相反的理论，便是離經叛道，異端邪說。數千年來，幾乎沒有人敢對於道統之說發生懷疑，固然是環境的影響，而更要緊的還是由於情性的束縛。因爲我們聽從父兄師長的傳統說法，是最省力不過的。但是另一方面固然是因其省力，沒有麻煩，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在世界上新不曾是冤枉活了數十年，祇落得做了一個武斷的傳統思想之囚徒。

我們大家都知道：牛頓因爲看見花園裏的蘋果落地，便發生疑問，因而發明了萬有引力定律；瓦特因爲看見沸水沖起盞蓋，便發生疑問，因而發明蒸氣機關；科學上其他許多的發明，差不多沒有一件不是因爲先有懷疑而來的。懷疑就是打破我們的情性，而我們能否打破我們的情性，就要看我們的愛知興趣，是否能夠勝過我們的情性。有了愛知的濃厚興趣，然後對於宇宙間的森羅萬象，才有要求了解的慾望，有了了解的慾望，才肯運用我們理知去求得可能的解答。所以「愛知」的興趣之養成，實在是在建立科學基礎的最基本的條件。

四、科學與求知的方法

愛知的興趣是對於事物發生懷疑，但懷疑祇是惰性的打破，而不是立刻可以建立新的真的知識。我們必須由懷疑而運用求知的各種方法，才有產生新的真的知識之可能。譬如牛頓看見蘋果落地，瓦特看見沸水沖盪，僅僅發生懷疑的態度，而不能用來見的方法去解釋他的疑問。尤其數也不過等於小孩子的好奇心理，疑問之間便又消失了。原始民族對於宇宙的許多自然現象，也未嘗不發生疑問，但是因為他們不能運用各種求知的必要方法，結果便得不到正確的合理的解釋，往往拿「神力」的意義解釋一切。從原始民族看起來，世界一切自然的人生的現象，無非是「神」的玩意。其所以拿這一個「神」字去解答一切疑問，當然是無可奈何的事。就是現代的所謂文明民族，恐怕也還有一大部分人說不了原始民族的意味。

我們中國數千年來的古聖先賢的愛知興趣，是偏重在主觀的情態方面，所以他們雖然十分的努力於學問，然而他們却不大講求求知的方法，就是有所謂方法，往往是直覺的或演繹的。換一句話說，就是憑主觀而直接加以判斷，或先根據一個已成的原則為前提，用以推證一切的結論，至於這一個前提所根據的原則是否正確，便不大注意了。單用這種方法以求知識，在人生和文藝方面，其流弊還不十分顯著，若是在科學方面，那就有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危險了。

我們想得到新的真的知識，至少要用歸納的方法，就是要先從許多個別的事物物，加以觀察，分析，比較，以求得一個共同的原理或原則，再加以反覆的試驗得到確實的證明之後，以成一種新的結論。歸納法的方式恰恰與演繹法相反，而適以相成。亞里士多德已經就用過了，可是後來因為耶穌教派勢力支配了歐洲整個思想界，僅僅把亞氏演繹法特別看重，而歸納法便被人束之高閣。到了近代培根的巨著「新方法論」出世，才又特別的提倡起來，而近代科學的抬頭，也就從此開始了。

科學方法當然還有種種，我此地不過舉一反三罷了。我們要能運用各種方法，對於論理學或說作邏輯和科學方法論，都得詳細加以深刻的研究，然後在主觀的方面，可以訓練我們的思維，在客觀方面獲得正確的知識。西人有言：「論理學是科學中的科學」；不明論理學而想升科學之室，入科學之室；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我國學者因為不重論理學，所以就是有名的文豪如韓愈亦常犯邏輯的錯誤，譬如韓愈解說：「角者吾知其為牛，驢者吾知其為馬……惟驢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詳也亦宜」。牛固然有角，馬固然有鬣，但，是角不是牛的惟一特質，豈不是馬的惟一特質呢？既說驢不可知，不可知則詳不詳豈然亦不可知，何以又說謂之不詳也亦宜？其後接着說：「雖然，驢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驢為聖人出也。……」這一段更不合論理學了，因為上面已經肯定的說驢是不可知的，何以能夠說驢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驢為聖人出？而且驢與聖人在位不在位，又有什麼必然的關係呢？我們可以說驢驢實在統編百出，然而這樣的文章居然在中國文學上佔有極高而又極鞏固的地位。孟子也常犯邏輯錯誤的毛病，試舉一例，他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愛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他對於大前提小前提都是由主觀的偏見武斷成立，當然結論也必然是不正確的了。其餘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可見我們的民族，對於論理學是怎樣不重視，科學基礎是怎樣的脆弱！

因為不講論理學，所沒有正確的概念，而是非真偽亦往往不易明白，一切事物物都不妨以馬馬虎虎的態度，含含糊糊的去應付，於是「差不多」，「大概是」，「好像是」，等等的毛病，都存在我們民族心理當中，而絲毫不感覺其為害之大。我們有了數千年的文化而始終走不到科學的途徑，不講求求知方法實在首要的原因。此後如果依然不向此處加工，要想使中國的科學基礎建立起來，真是緣木求魚了。

五、剔除民族心理上的科學障礙

究竟怎樣才能使我們民族在不知不覺的當中自自然然的會具有愛知的興趣，習用求知的方法？要答覆這個問題，便又不能不回到我們民族的特性方面去追尋。

我們往往聽到人家說：「中國人是『科學的』」。為什麼不合科學？是因為那些缺點不合科學？我們必須檢點一下。

第一個缺點是在於不注意論理學的方法，上面已經說過了，不必再加論列。

第二個缺點就是沒有條理和系統的觀念。這也可以說是因為沒有論理學的訓練而連帶發生的必然現象。我國學術的最高潮，當然要推春秋戰國時代，那時的諸子百家，燦爛光輝。可是我們把先秦的遺著來看，雖然各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有一共同的缺點，就是缺乏條理和系統。所以他們的著作裏面每一篇所論的，很少有一定的層次與一貫的系統，他們的思想每每是用極散漫的方式表示出來。以致後人要研究他們的學術，除了用淘金的辦法，從許多混雜的泥沙中去揀選東關西爪的精華以外，簡直不容易得到正確的概念。

但是條理與系統的觀念，在科學方面是很重要的，例如關於太陽系各行星公轉與自轉的道理，固然是由系統的觀念所構成；而化學上關於週期律的發明，也是拿各種原質排成一個系統而來的。總而言之，一切稱為科學的東西，都少不了系統觀念。

第三個缺點是沒有深入和澈底的精神。中庸二字是我國先聖先賢做人的最高標準，要合乎中庸之道，當是在於無大過無不及。在身心修養方面本來可以厚非，但是用在理智方面就不深入和澈底的淺薄。譬如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種態度，本與科學精神相符合，但也容易使一般人安於不知的狀態。至於海潮明辨

謂讀書不求甚解，往往最能博得社會的讚賞，認為是名士的特殊風氣，更不是深入澈底的最好例證。

不僅深入不能澈底，知識是絕無進步之可言。譬如過去我國對於宇宙本體的解釋，原有所謂陰陽五行之說，陰陽五行之說雖不足以語於科學，但不能說沒有玄學的或哲理的價值。高是固屬沒有人更進一步去澈底追求，所以結果便演成種種迷信的方式。古代希臘哲人亦有宇宙的本體為地，火，風，水之說，而希臘克利圖氏（Cleo Cleo）及羅馬的盧克里西氏（Lucretius）則進一步的主張宇宙由許多原子構成而成。到了十九世紀的達爾登（Dalton）又從氣體分析的結果，發明了定份律，倍分律和換份律，原子論的價值，便增高不少。但是西洋科學家並不以此為滿足，因此到了最近的三十年間，由放射化學及光學的研究，又證明各種原質都是由同一的原本物質——電子——所合成而成，於是又有電子說的成立。西洋方面對於宇宙本質之所以有最進步科學的見解，而在我國則自從有陰陽五行之說以後，始終還是停滯於玄學的或迷信的階段，就是因為西洋人能深入澈底，而我們却是不深入不澈底的原故。所以在道德方面我們遵守著無過無不及的教條，而在理智方面，就非有深入和澈底的精神不可。

第四是缺乏正確的概念。什麼叫做概念？凡是由知覺記憶想像等作用所生的具體心象，心理學家謂之「表現」，亦曰「觀念」。譬如我們由眼官所見的日月山河都是。表象是個別的殊相，包括許多個別的表象而組成一個統一的共相，就是「概念作用」，由此作用所得的結果，就是所謂「概念」。概念在論理求知方面是很重要的，假如我們討論某一個問題，而對於題目沒有一致的正確概念，那麼，會弄得牛頭不對馬嘴，徒然發生無謂爭辯，而永遠得不到結論。

關於概念的培養正確，孔子會有正名的努力，論語云：「子路曰，衛君待子而後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中，刑罰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也，言之必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孔子的正名很有道理，正名就是等於把「概念」弄得清清楚楚，而名就是代表概念的，譬如「君」字就是代表一切做人主的共同概念，「臣」字就是代表補助人主做事者的共同概念。不過孔子的正名工作，似乎除了邏輯上的意義之外，同時更着重倫理的意義。所以一方面正名，另一方面又主張定分。其結果則邏輯的價值大大的損失了。

此外還有一派名家，如惠施公孫龍等的正名工作，和孔子的正名，頗不相同，因為他們所主張的堅白異月之說，專從邏輯的意義做工夫，關於釐正「概念」方面的貢獻不少。可是這一派的學說後來因為與儒家的正統思想相去太遠，不獨未能發揚光大，而且幾乎認為是多餘的不必要的工作。

我們民族對於概念的不正確，可以拿古書上許多慣用的「名」，例如「聖人」、「賢人」、「君子」、「小人」……來著，就不容易得到一致的概念。不錯，諸君孔子所認為是聖人的，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及伯夷、叔齊等，我們分析起來，堯舜是領導他天下的，禹是傳天下於子的，湯武是革命而奪取天下的，文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周公是代成王臨。而代行天子職權的，伯夷叔齊是因爲反對武王奪取天下，而像死首陽山的。他們的主張和行爲各不相同，如果堯舜是聖人，大禹便不是聖人，湯武也不是聖人，湯武是聖人，伯夷叔齊便不是聖人，武王周公都不是聖人，如說他們都是聖人，我們到底何去何從，豈不是一個大大的難題嗎？

這不但是舉一例而已，其餘類此者，實不勝枚舉。概念既不正確而想階上科學途徑，是不可能的。

第五是缺乏客觀的理知主義。我們民族是重現實的，因爲重現實所以崇尚功利主義，觀者治學，無非是望取功名，上以顯父母，下以澤鄉里的。而本身則無成識，高官厚祿。其間雖然也有「正其義不謀其利」的儒學之士，但也是鳳毛麟角了。本來學而優則仕，學以義用，也是有的事，但是過於求功，就會求速效，求報酬，比取巧能作的流弊當然連帶而來。至於爲了解宇宙自然現象，爲追求人生意義，爲發明純粹科學原理等等研究工作，當然也連帶的要被認爲最愚笨的事了。

宋元明以來的理學家對於理知的追求，似乎比較的重一點，譬如他們對於大學上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那一章特別的用力，就可以看得出來。不過理學家雖著重理知，却是他們始終站在主觀的方面用直覺的方法去格物致知，而不知道在客觀方面用科學的方法去格物致知。所以他們格來格去，越格越遠，反而格格不入。據說王陽明因爲要格物，嘗對着門前一叢蒼竹冥思幻想，一連幾天，結果不但格格不出什麼，反而生起病來了。因此放棄了此種勞而無功的格物工作，回轉頭來，依然從主觀方面用直覺的方法去冥思幻想，而發爲「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學說。

宗教和玄學在往是以主觀的直覺的方式去冥思幻想，構成一個系統，成爲一套的理論，但科學斷不能如此，即哲學亦不能如此。我們要確立科學基礎，固然也須格物致知，然而我們非站在客觀方面用科學方法去格物不可。

六、結論

上面通篇所說的，本來是科學家的老生常談，也可以說是教育家的老生常談。其所以不憚而言之者，乃是因為我們民族到了現在的生死存亡關頭，除了完成總理三民主義的革命雜誌以外，沒有第二條出路，而三民主義的完成，又除了建立我國的科學基礎以外，沒有第二

的可能。因爲三民主義是建立在科學上面的。如果我們的民族沒有科學的基礎，縱使我們勉強的把三民主義的招牌掛了起來，也還是等於在流沙上面蓋起大廈一樣，其結果畢竟免不了要倒塌的。

怎樣建立我國科學基礎，本來是一個很大很難的題目，要想詳細

新時代的女子教育

盧執兢

教育是建國的要素，是文化的泉源，國家的強弱，文化的盛衰，實視教育能否合乎國情的需要，教育的方法能否達到教育的目的爲基準，教育的方法係根據教育的目的來決定，而教育的目的則在使每一個人適合於他的生活方式；在使每一個人能供應國家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及國家的需要，是隨時代而產生的。同時生活的方式的反力復推進時代，如此互爲因果的演進，遂使教育由舊的階段進入新的階段。所以此一時代的教育與彼一時代的教育完全不相同，甚或站在相反的線上。

每一個時代的教育各有其特徵，因此每一個時代的女子教育亦有其特質。在封建時代的女子教育，其目的完全是忠君政策，與封建政策，提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口號，使女子甘心情願的放棄求自立的機會，俯首帖耳任憑男子的擺弄，在封建枷鎖中做所謂「完人」。到了半封建時代女子教育的目的，則又被宣家養德的理論所制，設立了女子學校，作爲女子由母家到夫家的線上的另一個點，女子雖然已有求知的機會，但不過只是一個如何做賢妻良母的準備工作。這兩個時代在方式上雖然不同；可是在目的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女子的一生場所事，只要其學得如何做一個賢良的家庭主婦，如何相夫教子而已。直到國民革命連帶統一全國的時期，總置換了女子教育的目的與方式。提倡女子解放，

細的敘述起來，原非這短短的篇幅所能濟事，所以本文祇是就幾個最顯本之點略加推闡，不詳不盡，在所難免，然而「管照一聞，可知其餘。」假使因此而有一拋磚引玉的效果，那就此論爲不虛作也。

在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一切平等。這就是新時代的女子教育，新時代的女子教育，應以三民主義爲基石。

今日之中國，已非十年前的中國，今日的中國社會，亦非十年前的中國社會，是逐漸的由舊的階段發展到新的階段，過去的中國社會，一個家族主義的社會，以小父權或夫權爲中心。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由家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亦即民族主義，以民族一切福利爲中心，民族主義是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所以女子教育已換了賢妻良母主義的模樣，而創製三民主義的規範。

三民主義的女子教育，其目的當在教育女青年，成爲民主國家的好公民，她們的精力能夠担起對國家對國兩重的責任，她們的知識能負起時代的現的，並且能夠執行她們應有的義務，也能享受她們應有的權利。所以在原則上應竭力提倡男女平等，儘量培植女性人材以擔當國家之實

的責任。

三民主義的女子教育的第一個階段，即初等教育應完全注重身心之發展。培植勇敢的精神和快樂的心情。並養成吃苦耐劳的生活習慣，高尚的道德，具備了快樂的情緒和勇敢的精神，對於學識技能不斷的奮進修對於事業技能不斷的在努力，不畏困難，不怕犧牲，縱使遇到了艱

多打擊，不至於走上消極與悲觀的道路，可以再升再起再按再厲的苦幹，以達到事業的完成；因此，在中等教育所採取的方法，應根據三民主義發展其個性培植其天才，不給孩子們以過分有形的拘束，而處處以無形的法則與規範來誘導和啓發孩子們的知慧，以達到三民主義教育的目的。

女子教育的第二個階段，即中等教育，應注重在用的知識與技能的培養。使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進可爲造辦社會的公民，退可爲美家庭的主婦，既可齊家亦能治國。因爲在接受中等教育的時期，過去規定的十三歲到十八歲，實際常常是十六歲到二十二歲，等到結束中等教育的時候，已取得公民資格，同時亦已達到結婚的年齡。所以一方面應該具備共和國公民的一切條件，一方面應該具備科學時代主婦的一切條件。就業與結婚，須視其環境及志趣來決定，不能視任何一項爲正常，或不正常，更不應認爲每一個中學生都當升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若全國中學生都應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當然是合乎我們的理想；不過在此時期，全國青年能夠有接受中等教育的機會，已屬難能可貴，全數接受高等教育則須待若干年後。所以女子中等教育所採用的方法，應注重雙方面的：一、家庭的與社會的知識的訓練，在科目中應加入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及家政等各項必修科，不單注重各部門的理論，而同時還要注重各部門的應用，如教員得人，選擇適宜的教學法，定可引起學生的興趣，不致如過去受學習者的厭惡，尤以家事一科，每每使女子不願研究。二、入社會的訓練，其訓練應注重於實踐。

三民主義的女子教育第二個階段的知識是必要的，治國的知識也是必要的，缺少前者不能成爲科學時代的家庭主婦，缺少後者不能成

爲共和國家的社會工作人員，在這時代的女子必須可以留在家庭，也可以走入社會，缺少任何一方面的知能，就不足稱爲現代的女子。也不能成爲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公民。

女子教育的第三個階段即高等教育，以發展每個人的志願與興趣與培植各部門建設專門人才爲目的。其教育的方式，可採取現代的大學教育方式，惟學科方面應與社會需要相配合，切不可使學不能致用，在當前的環境中，尤應集中力量培植國防科學人才以從事參加國防建設工作。

在以上三個階段中，第二個階段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女子教育，祇係奠定基礎的準備工作，第三個階段的女子教育，則爲進一步的磨礱工作，只有第二個階段是完全學習的一個階段，同時在這個階段要特別注意的是兩性交際問題，應多給他們及他們正常的方式往還，從人與人的關係中給以倫理教育。在學習的階段中，不限於從教室及實驗室中學，須從整個的宇宙中去學習，從各方面承受知識與經驗，使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能夠負起對家對國的兩重責任，如升入大學亦可瞭解求學的目標和方法，不致盲人瞎馬的亂撞，學不能致用，而徒費了時間和請神，結果是對於本身對於國家兩有損失。現在的學生在畢業以後，升學的最苦惱的是不知道升學應應選擇何科何系，不升學的家庭裏到社會去都感到學識的不夠用，這種教育是失敗的。

現在提倡賢妻良母主義的女子教育，已成過去的歷史上的名詞，尊重女子人格的三民主義的女子教育應迅速的實施，只有教育的優裕而沒有明確的教育目標，對於女子本身，對於國家民族，都是極大的損失，希望不久的將來，三民主義的女子教育能在我國實現。